

學人風采

重返1949年中國革命： 沈艾娣教授訪談（下）

● 張 寧

編者按：本文第一至二節已於2025年4月號刊出，本期刊出第三至四節。

三 1949年中國革命及其反思

張寧：這次訪談，我們主要談論您有關1949年的新課題^①。這本書的標題暫定為《中國1949年：選擇的一年》(*China 1949: A Year of Choices*)，不僅轉向了1949年中國革命的研究，並且選擇做一個全國性的大題目。您為何對1949年產生興趣？中國學界的歷史敘事側重「斷代」(periodization)的影響，強調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斷裂、差異與改變。您會在這本書中討論1949年對於中國歷史而言，是斷裂還是延續的問題嗎？此外，您準備如何在新作中整合全球史的視角？

沈艾娣：我之前寫了很多微觀史，微觀史有微觀史的好處。但微觀史很難擁有大規模讀者群，因為大眾讀者通常只對比較大的題目感興趣。從全球的視野來看中國歷史，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國外，都會認為1949年是一個新的開始，大陸會說「解放」，台灣則用「淪陷」。在英國的歷史教學中，我們通常認為1949年是一場共產革命，但這場革命實際上是甚麼，我們不一定能講得很清楚。英語歷史學界過去更重視革命發生的原因，多談論共產黨延安時期的思想與經驗，但論述1949年應該着重1949年當時的情況。關於1949年的英文

* 本次訪談分別於2023年11月20日與2024年1月5日進行，距今已有相當一段時間。其後，沈艾娣教授在相關研究與新課題上已有進一步的探索與發展，敬請讀者關注她未來的學術成果。

著作多聚焦於國共內戰的過程，並以內戰結束、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布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」作為結尾，因此對 1949 年的敘述往往一筆帶過，迅速結束。

近年來，學界提出不要用斷裂的眼光來看 1949 年的歷史，歷史學家一直圍繞斷裂和延續展開辯論，但我對此並不感興趣。我感興趣的是對於中國人民，或者說住在中國的人來說，在政權改變的這一年，他們的生活與心態是怎樣的。中華民國時期有很多西方人住在中國，在 1951 年之前他們大都離開了。中國史當然不能與世界史割裂，比如當時那麼多國民黨的軍隊撤退到泰國、越南等地；蘇聯在 1949 年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這關乎「歷史交叉」(histoire croisée) ②，不同國家之間的聯繫非常重要。

張寧：您目前有關 1949 年研究的計劃，格外關注社會各階層的普通人在這一年面臨的選擇，是否想要回應西方學術界乃至西方社會對於中國當代史的一些誤解？您可以總結一下 1949 年課題主要關注與要解決的問題嗎？

沈艾娣：並非如此，我現在更關注的是釐清自己過去的誤解。你們有沒有稻草人論證 (straw man) 的說法？就是在辯論中，人們常常假設一個虛構或被扭曲的對手觀點，然後對其進行批評。當我們要指出某人的論述不成立時，常會說他攻擊的其實是一個「稻草人」——那個論點根本不存在。牛津大學在本科生教育中，一向重視辯論訓練。比如，前英國首相約翰遜 (Boris Johnson) 在考慮一項政策時，會寫兩篇文章：一篇支持，一篇反對。評論員會說，這是他從牛津的訓練中學到的。這種對觀點的全面思考與辯證，在學術界來說尤為重要，也深深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方式。

你的有關中國志願者參與緬甸共產黨武裝鬥爭的研究，可以與藍詩玲 (Julia Lovell) 進行對話 ③。而我的 1949 年的題目，是跟我之前的授課講義



沈艾娣教授近年轉向 1949 年中國革命的研究。(圖片由沈艾娣提供)

進行辯論。我之前所教授的內容，多為人們對於1949年革命的一般性思考，而我逐漸發現自己的講義裏存在不少錯誤。比如，我教授的一門課是關於「1949年革命與土地改革」，但後來發現1949年幾乎沒有甚麼土改，因為當時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政策，即「減租減息」政策。土改要麼發生在更早的時期，要麼在1950年以後才真正展開。普通人對於共產主義、對於土改，例如土改的具體方法，究竟了解多少，有待商榷。過去西方學者提到土改，往往強調它在動員農民參加革命、配合解放軍徵兵上的重要作用，也關注土改的暴力過程以及對地主階層的損害。但較少有人討論土改對於大多數農民是否真正具備吸引力。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。我曾訪談過一些山西的老年女性，她們會講解放前吃了很多苦，被迫當童養媳，直到土改後生活才變好。這樣的敘事當然是正確的——土改完全改變(transform)了她們的生活。但問題是土改真正發生之前，她們是被土改吸引，還是害怕土改呢？面對土改，一個農民到底會想「我能拿到土地」，還是說「我害怕鬥爭」？這是一個至今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問題。

張寧：農民參加土改的積極性，能否被視為一種態度的表達？

沈艾娣：積極參加也可能是來自投機份子與機會主義者。再比如，我過去在授課中會說一些人逃到台灣是因為他們害怕共產主義；如果他們跑到北京，就會說他們選擇了共產主義。現在發現事實並非如此，很多人一開始對於共產主義所知甚少。他們並不是看了書，然後選擇共產主義政策。即便是那些選擇了共產主義的人，有時候也很快認為自己的選擇是錯誤的；人們對於國民黨的選擇也是一樣。例如，1949年初，朱西甯隨國民黨軍隊來到台灣，接受新軍練兵僅一兩個月後，便對國民黨感到失望，認為自己做錯了選擇。但他後來也並不認同共產黨，反而成了一個反共作家^④。可見，他的選擇並非一蹴而就的。所以，當時的人們如何理解共產主義，是我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。

我一直對哲學不太感興趣，並不是很熟悉馬克思主義，接下來需要增加這方面的知識。我現在對《學習》雜誌很感興趣，這份雜誌展現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工作情況，如黨員怎樣解釋共產主義、新的解放區如何理解共產主義。而我們之前的學術研究中幾乎沒有講這個很重要的問題，我們都說他們選擇了共產主義，但他們理解的共產主義到底是甚麼樣的呢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。我有個博士生寫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女性，她發現有些女性在這個時期參加共產黨，不是因為一開始就對馬克思主義有系統的了解，也不是因為非常了解和認同蘇聯的歷史選擇，而可能出於很多其他的原因。比如，有些女性一開始對共產黨有好感，是因為很私人的關係——她們接觸到身邊的一些共產黨員，非常佩服這些革命者抗日救國的努力，願意向他們學習，接受他們的指導，有些革命者甚至構成了她們對理想共產黨員的想像。在西方，我們都認為中國人入黨就是選擇了共產主義，事實上這些選擇有

很多不同的原因。再比如，也是從我的博士生的論文裏，我了解到中國「小資產階級」的說法與一般西方人理解的“petit bourgeois”完全不同。如果有人跟我提小資產階級，我會想到法國十九世紀的小市民，特別是小商店的老闆；可是中國人從十九世紀30年代乃至現在，還會由此想到帶有某些特定習性的知識份子。所以，他們當時的共產主義與我們英文世界裏所想像的共產主義很不一樣。

張寧：除了土改問題、共產主義的概念與接受史的問題，您還有其他關注點嗎？

沈艾娣：我對當時中國人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看法也很感興趣。當時人們最深層的恐懼應該是第三次世界大戰。國共兩黨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，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這種恐懼心理。儘管當時流行的一些說法是謠言，但這些謠言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般老百姓真正關心和憂慮的是甚麼。現在西方新聞界往往激烈批評謠言的擴散，但對歷史學者而言，理解謠言的產生與流傳也是研究社會情緒與政治文化的重要途徑。例如，牛津大學的史密斯(Steve Smith)就寫過一篇有關新中國建國初期「恐懼」與「謠言」的文章^⑤。

張寧：是的，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很重要。孔飛力(Philip A. Kuhn)的《叫魂：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》(*Soulstealers: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*)以及田海(Barend J. ter Haar)的《講故事：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》(*Telling Stories: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*)都是有關謠言與恐慌的佳作^⑥。在毛澤東時期，尤其是文革階段，中國重提世界大戰的可能性，這反映出1949年之後，中國人在一個與西方持續對立的國際格局中，對大規模戰爭的恐懼始終存在。我在閱讀紅衛兵與知識青年一代的日記與書信時，也注意到這類恐懼情緒。中國當時推動的三線建設，以及對外政策上的重大決定，也與對中蘇之間爆發戰爭的恐懼密切相關。

沈艾娣：不僅是中國，美國當時也很怕第三次世界大戰。在美國，兒童會定期在教室裏進行核武器演習。一個在美國鄉村長大的學者告訴我，他小時候有一次和哥哥在外面玩，突然聽到爆炸的巨響，兩個人嚇得立刻抱在一起，以為核戰爭爆發了。二十世紀40、50年代這種恐懼還影響到一些宗教。例如，在一貫道的史料中，就可以看到一些與第三次世界大戰相關的內容，當中融合了末劫思想與末日想像。直到現在，人們還是會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戰，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。對於冷戰所造成的長期心理與文化影響，美國的文化史學者已經進行了相當多細緻的研究，日本學界也出版過一本十分出色的冷戰文化史著作^⑦。然而，中國至今關於這方面的系統性研究仍相當有限。

張寧：您如何看待冷戰時期有關1949年中國革命的西方敘事及其可能的偏見？您如何與這些敘事進行對話？

沈艾娣：我們有不同的敘事。首先是中國傳統革命史的敘事，有關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敘事是類似的。其次是西方學界長期的討論焦點，即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斷裂還是延續。如果說它是延續的，當然可以找到很多方面的案例來論證，因為社會不會瞬間改變。此外，還有冷戰史與世界史的討論。例如米特(Rana Mitter)主張把中國的抗戰放入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框架中來理解^⑧。這樣一來，中國就不只是自己的內部革命，而是參與了全球性戰爭，中國革命就變小了，因此中國人一般不喜歡說中國的抗戰屬於二戰。其實中國戰場與歐洲戰場都屬於二戰衝突的組成部分，規模與影響都很大。我認為將中國戰場與歐洲戰場做比較是沒問題的。冷戰史屬於世界史，我們剛才提到的中國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擔憂，其實就是冷戰思維的體現，這種思維不只存在於中國，也是一種全球性現象。這就把中國納入了世界史框架中。

總的來說，學術界對相關議題存在多種敘事，我目前尚未完全確定自己的書將與哪些敘事進行深入對話。目前我所回應的，主要還是來自過去教學中使用的、較為基本的革命史敘事。未來隨着研究的推進，特別是在進一步整理和思考一手材料之後，才可能更清楚地界定我的對話對象。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我尚未深入閱讀，未來會在這方面投入更多時間。因此，目前所提出的觀點可能仍有不少錯誤與不足，許多值得參考的學者與著作也尚未來得及提及，還請讀者多多包涵。

四 優秀史學作品的標準

張寧：在您有關1949年的研究計劃中，您如何選擇研究對象？在您探討這些個體時，將如何確保他們與更廣泛的歷史背景相互呼應？

沈艾娣：這是有關「代表性」的問題。我過去寫劉大鵬的時候，很多人就一直問我他是否具有代表性，我說我不追求「代表性」。但我現在會考慮「代表性」。問題是我才開始研究，所以找到的資料都是容易獲取的。我遇到的挑戰是，官方出版的回憶錄，大多數是關於男性的；女性的資料則很少，只有一兩個人。我關注的人物中包括一個生活在中國東部的知識份子、一個西北的農民(侯永祿)。我還對流亡學生感興趣，在他們的回憶錄中，我看到了一個女學生的回憶文章^⑨。我想找一些不同的人，慢慢地挑選重要問題，這是一個平衡的過程。

對代表性人物的選擇，我不會按照階級之類的分類，而是按照我的考量，選擇那些資料豐富、又能吸引西方讀者的人物。比如說文史學者宋雲彬，

有關他的材料很豐富，他還有記者的視角，也就是說，他很有眼光和見識，可以看出甚麼才是重要問題。他參加一個晚會，跟很多人聊天。一般人只會記錄今晚自己與誰聊天，但他會寫跟某個人聊天，此人告訴他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以及這個故事是甚麼。宋雲彬還會在日記裏記錄日常生活，例如寫他如何親自洗衣服，並為此感到苦惱。再比如，政治協商會議開會，他會寫早晨布置房間，沙發太多，不好安排。他把和沙發有關的內容寫在「政協」的前面，也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當時的政協——「沙發」可能與「政協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^⑩。

張寧：所以說，我們認為 1949 年是多麼偉大而重要的、緊張的一年，但對於處在歷史當中的人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同等重要。您期望自己通過這項研究得出哪些主要結論，這些結論將如何影響我們對 1949 年及其後中國歷史的理解？

沈艾娣：現在回答這個問題還太早了。我對這個問題有意見，我們平時讓別人申請研究資金的時候，都會要求申請者提前說明結論和貢獻——這在西方很普遍，在中國恐怕也很普遍。我理解他們為甚麼要這樣要求，但這樣做不一定會產出最好的書。例如，有些人申請資金的時候寫了很漂亮的結論，拿到了錢，但他們根本沒有甚麼好資料。所以，我覺得這種要求不太好，提前得出研究結論也很奇怪。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，研究應該是從資料開始的。我這個學年有兩個學期的學術休假，看了一年的資料之後，我才能提出一些小結論。這些結論不一定是對的，但起碼我會有一些觀點。做近現代史研究，資料很多，可以說是一個挑戰。

張寧：您剛才也提到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在 1949 年的情況。外國人離開中國是 1949 年後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，如果您能找到一個有趣的人物，追溯他當時的足跡，應該也是很有趣的。

沈艾娣：我可能還會寫一些外國人，這一類的資料應該也很豐富。歐洲人、美國人，以及在上海的猶太難民，在 1949 年後都離開了。這對生活在上海、廣州這種地方的中國人而言，會是很大的改變。我們教會裏有一位身材矮小的神職人員，1951 年出生於甘肅定西縣。他的父親是在中國傳教的挪威傳教士。這位老人現在需要重新申請英國護照，但是他看不懂自己的出生證，於是拿給我看。他的出生證太有意思了！那根本不是一個正規的出生證，而是一塊很小的碎紙片。在出生證上面，他的名字叫「白定寶」，是一個當地的好名字，根本看不出他是外國人。這個出生證其實稱為接生證，竟然能被英國政府接受。給他寫這個證件的並不是醫院，而是給他接生的醫生。醫生的字體很漂亮，還蓋了自己的小印章。後來老神父的母親告訴他，那個地方非常窮，窮到沒有一張牀用來給孕婦產子，他們就把門板取下來給他母親當牀

用。三個月後，他的父母抱着他走了五天，到了蘭州。過去連那麼偏僻的甘肅農村都有外國人傳教，但他們也都離開了。

張寧：您之前的每一本書都兼具專業性與可讀性，在1949年這個大課題上，您覺得還能實現這一目標嗎？據我所知，您也有擔任各類評委的經歷。根據您的經驗，評委如何判斷一部歷史作品優秀與否？這是否會影響到您新課題的寫作風格與內容選擇？

沈艾娣：我多數的書還是比較偏向西方學術界的。1949年課題是以西方普通民眾為目標讀者群。一些很好的研究，一般讀者不一定會感興趣。比如說天主教村莊這一本〔《傳教士的詛咒》，詳見本文上篇〕，並沒有銷售一空。寫這本書的時候，我要講故事，但同時也要和做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學者對話。一般的英國讀者不理解這些辯論，對一個偏僻的中國天主教農村也根本沒有興趣。所以，面向一般讀者，只能選擇非常大且重要的題目，比如1949年革命。近年來，特別是中國大陸，出版了很多有關當代史的專著，英國與美國也有類似的著作面世，但大部分的英文讀者不可能閱讀這些書。所以，我希望寫一本給普通讀者閱讀的書，其中既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發現，也介紹學術界的新見與思想。我還想補充一點，西方人寫的中國史常常會被翻譯為中文，可是中國人寫的中國史很難翻譯成英文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。我最近看了高華《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：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》一書的英文版^①，發現其中有許多複雜的細節可能對一般西方讀者來說比較難理解。畢竟，這本書討論的是中國政治歷史中的特殊脈絡，而不是每位讀者都有這方面的背景。對於有中文能力的專家來說，很多人會選擇直接閱讀原文版本。所以我會想，這類譯作的讀者群會是誰。

我想回歸到英文世界在二十世紀的寫作風格。在個案研究流行之前，西方人寫歷史普遍會寫很大的題目，例如芬利 (Moses I. Finley) 有關古代地中海的研究^②，托馬斯 (Keith Thomas) 有關魔法衰落的研究^③，後者是1972年首屆沃爾夫森歷史獎 (Wolfson History Prize) 的獲獎作品；還有肯 (Maurice Keen) 1984年寫的《騎士制度》(Chivalry)^④，也獲得了沃爾夫森歷史獎。我之前有個同事是肯的孩子，他們仍在收取父親著作的版稅收入。這類書毫無疑問是優秀的學術研究，同時也適合大眾閱讀，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寫這一類書。但我不知道能否將1949年這一題目寫成這樣一本書。因為這個話題非常主流，我們都認為自己了解一些，講了很多年的課，後來發現我們所講的存在一定的錯誤。

寫一本既考慮一般讀者、又能受到專家認可的書，實在太難了！我近幾年比較了解一些評獎委員會。2021年，我是坎迪爾歷史獎 (Cundill History Prize) 委員會的成員。我們當時必須選擇一本可以供大眾閱讀的歷史著作，最後選出了一本寫黑奴起義的歷史書^⑤。這本書之所以獲獎，一是因為作者使用了豐富的荷蘭文資料，包括海量的、完整的檔案資料；二是在美國，很多人對

黑奴史感興趣，但他們不懂荷蘭語，無法利用這些檔案。相關專家對這本書非常感興趣，因為他們對這場起義一無所知。對一般讀者而言，比如說我，也覺得這本書很不錯，它讓我了解到奴隸在南美洲的生活及其背景。

張寧：所以，您想回歸英文世界在二十世紀的敘事模式，以大眾為目標讀者，在關注宏大主題的同時兼顧學術價值。您的回答不僅對我們的學術思考有幫助，而且提醒我們在寫書的時候一定要考慮目標讀者是誰，要採用甚麼樣的敘事風格，要解決甚麼問題。

沈艾娣：和出版社編輯聊天很有用。我這次是和企鵝出版社（Penguin Books）交流，了解他們的讀者會對哪些題目感興趣。他們建議我應該看哪些類似的資料，推薦我讀有關德國史的研究，尤其是納粹德國的歷史。德國史研究很重視民眾史，老百姓的聲音如何傳遞給政府是德國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，他們的史學方法很好。

張寧：是的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「理想國譯叢」裏就有一些有關納粹德國史的書目，還有和蘇聯斯大林時期相關的專著。這些作品重視普通人的聲音與生存狀態，讓人印象深刻。您之前提到您在寫每本書的時候，都有其他的題目被捨棄或推遲〔詳見本文上篇〕。1949年的課題與您之前的著作有沒有連貫性？除此之外，您還有其他被推遲的研究嗎？

沈艾娣：我還有兩本書想寫，一本是給西方大學生的中國近現代史課本。年輕的時候，我沒有寫課本的能力，現在我想寫一本出來。此外，很多年前，我就很想寫一本山西近代通史，但因為決定先寫1949年的歷史，所以只好將這個項目推遲。劉大鵬、傳教士以及李自標這三本書都是關於山西農村的〔《夢醒子》、《傳教士的詛咒》、《翻譯的危險》，詳見本文上篇〕。我做每個研究都發現了山西省的不同方面：寫劉大鵬，我研究了清末民國時期的山西史。寫天主教村，我了解了山西與世界、山西宗教的歷史；當然，佛教在山西也很重要，但我還沒學習過。然後，《翻譯的危險》是有關長治地區與世界的關係，其中包括明朝末年的山西。這個1949年的課題，我也想把山西包括在內。

張寧：「山西近代通史」一書是對您過去三十多年歷史研究的總結？

沈艾娣：是的。「山西近代通史」這本書將會是學術性的，目標讀者是對山西歷史感興趣的人。英國和山西一樣大，可惜英國大眾對這本書是不會感興趣的，但他們對中國革命感興趣。在我之後，還會有很多人寫1949年中國革命，恐怕寫山西史的外國人就不多了。除了在上世紀60年代寫閩錫山的美國學者季林（Donald G. Gillin）^⑥，我會是第二個寫山西史的外國人。（本期續完）

註釋

- ① 有關沈艾娣 1949 年項目的更多思考，亦可參見〈學人書香：英國牛津大學亞洲中東學系沈艾娣 (Henrietta Harrison) 教授談 1949〉(2024 年 1 月 24 日)，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，<https://asmhlibref.blogspot.com/2023/12/henrietta-harrison1949.html>。
- ② 相關定義與方法論，參見 Michael Werner and Bénédicte Zimmermann, "Beyond Comparison: Histoire Croisée and the Challenge of Reflexivity", *History and Theory* 45, no. 1 (2006): 30-50。
- ③ 參見 Ning Zhang, "Figh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sm? Two Beijing Red Guards in Burma", *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* 31, no. 2 (2024): 147-69; Julia Lovell, *Maoism: A Global History* (London: Bodley Head, 2019)。
- ④ 朱西甯為台灣知名作家，代表作有短篇小說《鐵漿》(1961 年發表於《現代文學》第 9 期)、長篇小說《八二三注》(台北：三三書坊，1979)。他的女兒朱天文、朱天心也是台灣知名作家。
- ⑤ Steve Smith, "Fear and Rumour in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50s", *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* 5, no. 3 (2008): 269-88.
- ⑥ Philip A. Kuhn, *Soulstealers: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* (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0)，中譯本參見孔飛力著，陳兼、劉昶譯：《叫魂：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》(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1999)；Barend J. ter Haar, *Telling Stories: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* (Leiden: Brill, 2006)，中譯本參見田海著，趙凌雲等譯：《講故事：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》(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7)。
- ⑦ Hajimu Masuda, *Cold War Crucible: The Korean Conflict and the Postwar World* (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5).
- ⑧ Rana Mitter, *Forgotten Ally: China's World War II, 1937-1945* (Boston, MA: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, 2013).
- ⑨ 冉亦文：〈「回首來時路，常懷感恩心」〉，載陶英惠、張玉法編：《山東流亡學生史》(台北：山東文獻社，2004)，頁 119-56。
- ⑩ 海寧市檔案局(館)整理：《宋雲彬日記》，上冊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)，1949 年 9 月 21 日，頁 224。
- ⑪ Gao Hua, *How the Red Sun Rose: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'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, 1930-1945*, trans. Stacey Mosher and Guo Jian (Hong Kong: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2018).
- ⑫ 例如，Moses I. Finley, *The Ancient Greeks* (New York: Penguin, 1963); *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* (London: Chatto & Windus, 1980); *Ancient History: Evidence and Models* (New York: Viking, 1986) 等。
- ⑬ Keith Thomas, *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: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- and Seventeenth-Century England* (London: Weidenfeld and Nicolson, 1971)；中譯本參見托馬斯著，芮傳明、梅劍華譯：《16 和 17 世紀英格蘭大眾信仰研究》(南京：譯林出版社，2019)。
- ⑭ Maurice Keen, *Chivalry* (New Haven, CT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84).
- ⑮ Marjoleine Kars, *Blood on the River: A Chronicle of Mutiny and Freedom on the Wild Coast* (New York: New Press, 2020).
- ⑯ Donald G. Gillin, *Warlord: Yen Hsi-Shan in Shansi Province, 1911-1949* (Princeton, NJ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67).